



lu xun yu shan xi

鲁迅与山西

LU XUN
YU SHAN XI
BEI YUE
WEN YI
CHU BAN SHE

北京文艺出版社

董大中
郭汾阳
王峻峰 著

DONG DA ZHONG
GUO FEN YANG
WANG JUN FENG ZHU

鲁迅与巴金

LU XUN YU SHAN XI

BEI YUE WEN YI CHU BAN SHE

董大中

郭汾阳

王峻峰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马森彪

鲁迅与山西

董大中 郭汾阳 王峻峰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20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5378—1765—0

I·1721 定价: 19.00元

序

李玉明

鲁迅大名，我在学生时代即已听说。有称为“大文豪”者，有称为“民族魂”者。为“文”专于一艺，与普通士子无缘；“民族”却人人有份，谁不关心？时日寇铁蹄践踏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是奋起抗日，还是苟且偷生？是跟共产党走，还是打起不抵抗主义的破旗？晴空响起鲁迅声音：“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十五岁走上抗日道路，既是内心的要求，也是应了时代的召唤。参加革命以后，当时条件艰苦，鲁迅作品是很难找到的，一旦获得，便是我最喜欢的文学读物，有些篇也是整风必读文献，根据地的报纸、杂志上还时有鲁迅语录刊出。我第一次看到鲁迅的光辉形象，就是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上登的那幅木刻鲁迅肖像。待读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对鲁迅的认识又大进一步。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就其功业而言。毛主席又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是就其人格而言。鲁迅的形象如日月经天，

如北斗星一样给我们指示方向。

“民族魂”者，为民族精神之象征，又可以铸造民族精神，使其更加纯洁和坚强。鲁迅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他的人格和煌煌巨著，有如春风化雨，泽被四方，惠及子孙后代。他在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成长，又把它改造出新，发扬光大。他弃医从文，立意改造“国民性”，“我以我血荐轩辕”，表现了志趣的高洁和神圣。他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提倡变革，鼓励前进。他坚持开放，实行“拿来主义”，从别处“盗得火来”，为我所用。他热情歌颂正义，歌颂新生，对一切腐巧的事物和丑恶的人性，予以无情的鞭挞，所谓“论时事不留情面，砭锢弊常取类型”。他主张“韧”的战斗，说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这一切，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的宝贵遗产。在现代文化名人中，对民族精神的提炼发挥如此作用者，鲁迅是首屈一指的。我曾想，我们研究鲁迅，固然要把重点放在鲁迅一生功业和其伟大人格上，但是，对其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形成上的巨大影响，也不应该放过。

前不久，山西省作家协会的董大中拿来一部书稿，是他跟朋友合写的《鲁迅与山西》。看到题目，我感到很新鲜。翻阅一过，竟有三十余万言。诚如书中所说：鲁迅没有到过山西（实际仅短时间到过黄河北岸的一个小村子），但他多次写到山西。他写小说的经验是，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是“展转”到太原教书的，“模模胡胡”地教学生念“子曰诗云”和《女儿经》之类。另一篇小说中的“我”，是“从山阳到历城，又到太谷，一总转了大半年”，“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到他回S城去看魏连殳的时候，手里还“提着两包闻喜

名产的煮饼”。在跟朋友谈话时，鲁迅以山西为例，好的不好的，为数更多。此一文化现象，值得研究。本书以此为出发点，上下古今，文物典籍，风俗人事，凡跟鲁迅有关者，或为鲁迅所涉及者，都搜罗笔下，爬梳整理，条分缕析。鲁迅对山西历史文化之评述、议论，深中肯綮，而又颇富警示，足供我们启发和借鉴；鲁迅与山西人士之交往，或融洽，或间有齟齬，有经验可作总结，亦有教训值得记取；鲁迅对山西政治青年和文艺青年的扶植、培养，对山西文学发展的影响，这些直接和间接、有形和无形的雨露滋润，我们更应该牢记在心。

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跟一些同道专心参与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工作，目的在于对三晋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本来源流和外来影响，它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梳理，俾成为中华文化研究的有机部分。董大中拿来的这部书稿，符合我们的研究需要，特编入丛书。通观全稿，不能说那么宏富，那么深刻，但它展现了一块新天地。我本人，过去陷身政务，无暇钻研学问，近十年来又忙于组织学者整理浩如烟海的山西传统文化，不能专攻。记得有一首悼念鲁迅的诗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鲁迅是一个永远不死的人。他活在人们心中，也活在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人的精神上、骨血里。今年是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现在把这本书献给海内外学者，一在纪念，一在交流，一在求教。书中存在不足或不妥之处，请不吝指正。

是为序。

1996年10月19日

于小石斋

前 言

董大中

读者看到这本书，也许会惊讶地问道，鲁迅跟山西也值得写吗？

是的，山西不同于北京、上海，甚至也不同于福建、广东；当然更不同于浙江了。但是，对于一位文化巨人说，一个地区跟他的关系，是绝不能用他是否在那里生活过为唯一取舍标准的。他在哪里生活过，那个地方自然有东西可写，即使没有生活过，那个地方同样值得写，因为那里有他的影响，有他的纪念活动，有他交往过的许多人。山西就是这样。

《鲁迅与山西》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已不新鲜了。早在七十年代末，我就想好了这个题目，并且作了动手的准备。由于研究赵树理更为急迫，我改变了方向。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我当时在《汾水》（今《山西文学》）编评论，特地开辟了一个《鲁迅与山西》的专栏，约请王瑶先生、冈夫先生、唐诃先生以及我的朋友王峻峰，分头写了文章。我在给王瑶先生的约稿信中写道：“鲁迅先生虽然没有到过山西，但是……”王瑶先生很快寄来了稿件，他在文章的开头用了我的话，题目上加了“漫笔”二字。王峻峰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鲁迅和山西的几件事》。冈夫和唐诃都是回忆，冈夫回忆鲁迅在北师大风雨操场的演讲，唐诃回

忆他跟鲁迅通信的经过，主要是鲁迅复榴花社信的经过。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1992年，《赵树理年谱》增订本写完以后，我想重新拣起这个题目，做一些工作。先用一年多的时间熟悉材料。拟出提纲后，跟一些朋友联系，想合作写书。恰巧王峻峰办了退休，有了时间。我们商定，先写出书稿再说，即使出版不了，也没有关系。其时我身体不好，时常闹病，进展不够理想。直到邀请年轻的朋友郭汾阳参加进来以后，写作才比较顺利。

写这样一个题目，有些问题不好解决，主要是收录范围难以确定。比如王冶秋和徐懋庸都跟鲁迅有过较多的交往，都在山西工作过，川岛年轻时在山西读过书，如何办？最后我们商定，在山西期间跟鲁迅发生交往，就写，如王冶秋，在山西期间不发生交往，则不写，如川岛、徐懋庸，徐懋庸在山西时作过《理水》注释，却应该写进来。总之，无论是谈交往，还是谈鲁迅研究、鲁迅纪念，总以跟山西有关为是。1924年初，李健吾先生担任师大附中校友会主席时，曾请鲁迅先生作过《未有天才之前》的报告，但不是他亲自去请的，请来之后也没有交谈，不能算直接交往，不便写入。鲁迅逝世后，李健吾发表好几篇文章，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他的小说《终条山的传说》作出很高评价的感受，和他对鲁迅逝世的无限悲悼，对鲁迅人格的无限崇敬，但他一直不在山西，也不好写入。同样道理，王瑶先生虽是山西人，但他工作的地点不在山西，学术成果也不是在山西作出，尽管他在鲁迅研究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们也无法写入。类似的情况很多。另有些人，过去认为籍贯在山西，但经我们调查之后，应予以否定，又该怎么办？我们考虑，对此不作个交代是不行的，于是就在《人物简介》里作了说明。

这本书是三人合作的结果。我负责全书总的策划和统稿及所

有其他事务，包括资料的搜集和复制。大部分章节是郭汾阳写的，计有《鲁迅与山西人士的交往》三章中除《“狂人”的原型》、《景梅九和鲁迅可能见过面》、《高长虹等人跟鲁迅的冲突》以外的其余部分，《鲁迅笔下的山西名人及其他》中的全部，《鲁迅留下的踪影》中的《在黄河岸边的一次逗留》以及《鲁迅藏书中的三晋文献和晋人著述》等文，还编写了《人物简介》中的部分条目。王峻峰写了《鲁迅与山西纪事》和《人物简介》中的大部分条目。《鲁迅与山西人士的交往》（一）中的《“狂人”的原型》是王峻峰把原《关于鲁迅和山西的几件事》中的第一节修改而成。《山西的鲁迅研究、鲁迅纪念》中的《晋绥边区的鲁迅逝世纪念活动》一文，是王峻峰早年所写，曾在《鲁迅研究资料》发表过。在人物传记资料的搜集上，王峻峰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余是我写的。由于是分头撰写，全书在文体风格上不够一致。所谓统稿，也主要偏重在事实上，不使重复或前后矛盾，文章风格没有改动。

今年是鲁迅逝世60周年。我们愿意用这本小书作为对鲁迅的纪念。就我个人来说，写这本书也是我整理山西现代文艺、文化史料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后将转向其他。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的热心帮助。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李文儒、王世家，代为复印一些资料。首都师范大学的阎守诚、山西汾阳县的武毓璋、王希良，临猗县的陈加文、李良，阳高县的郭海，介休市的侯加林、傅钟源，芮城县的景昆俊，永济县的韩彦平，平陆县的郭建星，运城行署的员创生，福建省的段鲁平等同志，对我们的求教，都给予热情回答。在此一并致谢。

1996年7月17日

目 录

序	李玉明 (1)
前 言	董大中 (1)
一、鲁迅与山西纪事	(1)
二、鲁迅论山西	
论山西矿产资源	(17)
论山西作家、作品	(23)
论山西人	(34)
三、鲁迅留下的踪影	
在黄河岸边的一次逗留	(36)
全国木刻联展在太原展出盛况	(39)
四、鲁迅与山西人士的交往 (一)	
“狂人”的原型	
——在山西游幕的阮久荪	(41)
印象不好的梁善济、景耀月	
——鲁迅在教育部的山西同事之一	(45)
“同司同室”的冀贡泉	
——鲁迅在教育部的山西同事之二	(48)
鲁迅与石评梅	(52)
鲁迅与山西的政治青年	(57)

鲁迅与吴曙天	(60)
鲁迅与阎宗临	(64)
“挖苦”过鲁迅的“捣乱”者张友渔	(70)
鲁迅与孔、阎等山西“巨头”	(77)
鲁迅、杜任之与“劳大”风波	(83)
鲁迅参与营救侯外庐和侯外庐对鲁迅的研究	(91)
鲁迅与唐诃	(96)
鲁迅与在山西的王冶秋	(109)
鲁迅与韩白罗	(112)
鲁迅与段干青	(116)
《鲁迅日记》中的田景福	(120)
为鲁迅作遗容速写的力群	(125)
附：景梅九和鲁迅可能见过面	(132)
五、鲁迅与山西人士的交往（二）	
鲁迅与荆有麟	(138)
六、鲁迅与山西人士的交往（三）	
常乃德攻击鲁迅始末	(182)
高长虹等人跟鲁迅的冲突	(189)
七、鲁迅笔下的山西名人及其他	
《雁门集》里的一片枫叶	(293)
鲁迅与汾酒	(296)
一篇“绛守居”的文章引起的话	(298)
“张老西”与张启和	(299)
晋祠当年的“生剖驴肉”	(301)
鲁迅谈“老十三旦”	(303)
《炭画》与张景良	(306)

从“冯起炎案”看“隔膜”	(308)
元好问的“名节”	(311)
司马光“敲水缸”和“《通鉴》的“食人”	(316)
关于傅山的“书话”	(319)
在美国和上海的《玉堂春》	(321)
论杨贵妃以及《杨贵妃》的写作计划	(322)
说关公的升降和“关公戏”	(326)
武则天及其他	(330)
八、鲁迅藏书中的三晋文献和晋人著述	(333)
九、鲁迅对山西文学发展的影响	
山西的两个作家群和鲁迅	(341)
赵树理的笔管里流着鲁迅的血	(358)
一〇、山西的鲁迅研究、鲁迅纪念	
最早的评论	
——高长虹	(382)
鲁迅逝世后山西的悼念活动	(389)
高沐鸿和《开展》上的几篇诗文	(400)
晋绥边区的鲁迅逝世纪念活动	(406)
晋冀鲁豫边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鲁迅研究	(414)
从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423)
李国涛的两本书	(426)
一一、人物简介	(434)

一 鲁迅与山西纪事

说明：本《纪事》为方便读者阅读而编，凡有专题论述者，略之，无专题论述者详之。

1903 年

10 月 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 8 期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收《集外集拾遗补编》）。在“世界第一石炭国”章中，引用日本地质调查者报告中图示的我国石炭田的位置，其中有山西石炭田六处，并说“山西省有烟无烟大炭田计之，约各一万三千五百方迈尔，合计七百万步。”

1906 年

5 月，与顾琅合编的《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收上海出版公司 1952 年版《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本书在阐述和介绍各省的矿产分布时，谈到了山西的矿产：“本省铁矿。以平定州盂县。及潞安府至泽州阳城县者为最著。其开采似始于二千五百余年前。逮唐乃弥盛。惜迄今日。而所操方术。与欧西数世纪前

者。犹无甚异耳。特铁质则纯良甚。经土法制炼后。不逊瑞典产。盖因矿悉褐铁及镜铁故也。”

1906—1907 年

在此期间，有可能跟安邑（今属运城市）人景定成（字梅九）在章太炎寓所相见。此事无文字记载，系景梅九于四十年代告门人李尤白，李尤白写信告董大中的。只能作为存疑，暂记于此。详见本书第四章所附《景梅九和鲁迅可能见过面》。

1912 年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次长为芮城人景耀月。许寿裳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当即同意，请许代函邀请。鲁迅于3月初到部任职，从此与景耀月为同事。

与鲁迅同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的还有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汾阳人冀贡泉。

1913 年

年初，社教司接到山西一份申办“宗圣会社”的呈文，鲁迅等几个人觉得那名目、目的和文体都可笑，恰此时冀贡泉进屋，不知怎么一回事，鲁迅以实情相告。

3月27日，辑录谢承《后汉书》毕，共6卷，约十余万字。本月并写成《谢承〈后汉书〉序》（收《古籍序跋集》）。谢承，三国时吴国会稽山阴人，所著《后汉书》宋代已失传。鲁迅在“序”文中举出“清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以校《曹全碑》，无不合”，这是据《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部谢承条阎若璩夹注的傅山自云其家有

“永乐间扬州刻本”谢承《后汉书》，“合阳曹全碑出，曾以谢书考证，多所裨，大胜范书。”可惜“寇乱亡失”。所以鲁迅说：“然他人无得见者。”《曹全碑》即《汉合阳令曹全碑》，东汉碑刻，记当时合阳（今属陕西）县令曹全事迹，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出土。

4月27日晚，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在前门外劝业场小有天饭馆，向即将离任回山西的冀贡泉饯行，与会者十人。

11月8日，在琉璃厂有正书局买得石印《傅青主自书诗稿》一册。

1914年

1月13日，收到二弟作人寄来的竹垞抄《傅青主持》（“持”，原文如此）一册。

1月16日，“晚顾养吾招饮于醉琼林，以印二弟所译《炭画》事与文明书局总纂商榷也。”（《日记》）总纂为山西人张景良。

2月5日，为许季上保山西人翟用章，投考知事。由在太原的冀贡泉所介绍。

3月1日，往琉璃厂买有“长子”、“襄垣”等字样的小币四枚。

5月12日，新任教育部次长梁善济到部。《鲁迅日记》载：“山西人，不了了。”

6月6日，往琉璃厂买得印有“安邑化金”的圆足布一枚。

10月15日，“出律事保结二：冀贡泉、郭德修，并山西人。”（《日记》）此为冀、郭来京办理登记律师手续，请鲁迅具保。

1915年

1月1日，教育部普教司主事狄桂山，崞县（今属原平市）人，前来拜访鲁迅。

3月29日，鲁迅将在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百喻经》分赠汤化龙总长和梁善济次长各一册。

4月3日，由许季上介绍，保山西投考知事者二人：景万禄、白尔玉。

4月4日，通过杨莘士作扎，寄西安吴葆仁信并银五元，托买碑帖，其中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该碑唐天授三年立，在山西猗氏县（今临猗）仁寿寺。全文见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五。山右即今山西。11月6日，鲁迅在琉璃厂买得《山右石刻丛编》一部，二十四册。18日鲁迅以精拓本校完《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并写出《〈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一文（收《集外集拾遗补编》）。

7月1日，在琉璃厂购得拓片三枚，其中有一枚是《潞州舍利塔下铭》，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刻，隶书10行，行12字并一行小字。另购有多种山西碑拓和著述，不俱载。

8月6日，冀贡泉因事来京，晚请鲁迅等饮于泰丰楼，同席十人。

8月8日，午前往高升店访冀贡泉，冀已行，未遇。

9月6日，午后往京师通俗图书馆，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听取首任会长梁善济关于该会宗旨的演说。

1916年

1月6日，由宋子佩带来宋芷生所贻《晋祠铭》并复刻本。

3月24日，晚约表兄阮和荪往广和居饭，阮明日赴繁峙。

6月16日，收到表弟阮久荪12日从繁峙发来的信片。“晚宜古斋持拓片来，撰留隋《暴永墓志》并盖二枚”，“云山西新出土，未详何县。”（《日记》）

6月17日，给在繁峙的阮久荪复信。

7月21日，午与徐吉轩、齐寿山、许季上与来京的冀贡泉共宴于益昌。

8月27日，太原宋芷生寄来《山右金石记》一部，十卷十册，清代张煦撰，为《山西通志》第89卷至98卷之单行本，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9月15日，得表弟阮久荪10日繁峙函。

9月16日，给繁峙阮久荪复信。

10月3日，得表兄阮和荪自五台来函。

10月4日，给在五台的阮和荪复信。

10月29日，得阮和荪25日自山西来函。

10月30日，复和荪信。得阮久荪信。晚久荪自繁峙到寓，见其患“迫害狂”型的精神病，设法送医院治疗，病好后，雇人送其回家。以后又汇款给久荪。

1918年

1月3日，得阮和荪从山西潞安来函。

1月5日，复在潞安的阮和荪信。

2月7日，午后将《元遗山诗注》寄往太原宋芷生。

3月4日，得宋芷生2月28日自太原发来的信并拓片一包。

3月7日，复在太原的宋芷生信。

5月3日，在琉璃厂，购《王通墓志》一枚。

6月22日，得阮和荪自潞城来函。

6月24日，复在潞城的阮和荪信。

12月27日。往琉璃厂买“安邑”币二枚。